

勃沙特与红六军团的长征奇遇

与红军不期而遇

1897年，勃沙特出生于英国曼彻斯特。10岁那年，他听到一位传教士介绍中国的情况后，对这个古老的国度开始神往，从此刻苦学习中文。他的语言天赋极好，可流利地说德、英、法、汉几种语言。1922年，勃沙特被教会派往中国，在贵州镇远一带传教，他给自己起了一个中文名字“薄复礼”，以示信奉孔子的“克己复礼”。1930年，勃沙特和瑞士姑娘露茜在贵阳结婚。

1934年9月30日，勃沙特夫妇在黄平老县城旧州与传教士海曼夫妇度过了一个宁静的礼拜日。10月1日，他们在从旧州返回镇远的崎岖山路上，与一支队伍不期而遇。几天前，勃沙特听德国一位传教士说过，红军开过来了。他想，莫非他们是红军？他猜对了，他们确是萧克、王震领导的红六军团。作为中央红军的先遣队，红六军团于1934年8月从江西出发，转战数千里，正转向黔东打算与贺龙领导的红三军会合，并由此拉开了中央红军长征的序幕。

勃沙特夫妇被红军扣留。第二天，红军攻占了旧州，将另一对外国传教士海曼夫妇及两个孩子、女传教士埃米一并扣留，连同勃沙特夫妇一起交由红六军团保卫部看管审查。保卫部长叫吴德峰，勃沙特称他“吴法官”。吴德峰告诉他们暂时不能离开红军，他们要为红军筹措一定经费或医药用品之后才能获得自由。

不久，出于人道主义，红军主动将其他人释放，只扣押了勃沙特、海曼二人。萧克后来说：“坦率地讲，我们仍扣

留他们两人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需要的角度来考虑的。因为我们西征以来，转战五十多天，又是暑天行军，伤病兵日益增多，正苦于无药医治。我们知道这几位传教士有条件弄到药品，于是，我们提出释放他们的条件是给红军提供一定数量的药品。”

帮助红军翻译地图

在旧州教堂，萧克意外发现，教堂的墙上挂着一幅贵州地图，约一平方米大小。对不熟悉贵州地形的红六军团而言，这张地图非常珍贵。萧克马上把它取下来，但上面所标的地名都是外国文字。他让懂英文的吴德峰翻译，可是吴说这不是英文，推荐勃沙特来看看。

勃沙特看后，说地图是用法文标注的。萧克便让他帮忙把地图上的地名翻译成中文。于是，他们在一张四方桌子上展开地图，在一盏马灯的微弱光线下，勃沙特翻译，萧克标记，整整忙了大半夜，终于把萧克想要知道的与红三军会合的那个方向的重要山脉、村镇、河流等都注上了中文。

在同勃沙特的交谈中，萧克不仅知道了他的身世，还了解了一些有用的军事情况。勃沙特帮助翻译的这张地图非常有用，萧克说：“红六军团在转战贵州和进军湘西时，勃沙特翻译的地图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正是这张地图，使得双方都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50年后，萧克回忆这件事时仍感慨不已：“当时，我们在贵州转战，用的是旧中国中学课本上的地图，32开本，只能看看省会、县城、大市镇的大概位置，及山脉河流的大体走向，没有战术上的价

值。当我们得到一张大地图，那是多么高兴啊！虽然在那以前，我们对传教士的印象不佳，但这位传教士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帮助我们解决了一个大难题。”

在这张地图的帮助下，1934年10月24日，红六军团终于打破国民党各路重兵的阻截，抵达贵州印江县木黄与红三军胜利会师，任弼时、萧克、王震与红三军领导人贺龙、关向应等欢聚一堂。会师后，红三军恢复了红二军团番号。

红军战士称他“老勃”

当红军在湘西站稳脚跟后，勃沙特也有时间冷静地审视，红军到底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

他观察到“红军对穷人很好，时时忘不了帮助那些穷人”。“我们来到一个土豪家宿营。这里的一切，马上成了红军的财产。然后（他们）熟练而有条理地召集穷人将谷仓的粮食分光。”正因为此，所到之处很受民众欢迎，“每天有很多人到这里报名参军”。

萧克利用与勃沙特见面的机会，了解他的生活、行军情况，还经常把缴获的英文报刊带来让他翻译，以供领导人参考。有时还邀勃沙特一起娱乐。一次，勃沙特、海曼应邀参加联欢会，吴德峰小声说：“大家想听你们唱歌，但不得与宗教宣传有关。”当他们唱到高潮时，卫兵们都被吸引了过来。

萧克还嘱咐吴德峰对勃沙特他们尽可能给予照顾。开始行军时，因为多雨，勃沙特等人“提出要块油布，结果红军给了一个床单”。他们“后来才知道，这在红军中已是非常奢侈的供给了”。

勃沙特时常患病，红军专门请中医

为他看病，还为他定了特殊的伙食标准。一次勃沙特感冒了，浑身畏寒，连长让他在火塘边上睡觉，吴德峰说：“明天安排你骑马。”此后，这匹马一直供他使用。1936年元旦是勃沙特的生日，红军送给他一只鸭子作为生日礼物。

在一年半的交往中，勃沙特与红军官兵结下了很深的情谊。红军战士称他“外国人”“勃先生”，后来干脆喊他“老勃”。勃沙特也帮助红军购买药品，辅导使用英文打字机，修理煤气灯，还用自己的毛线为许多红军官兵织帽子、手套等。

1936年4月，红军长征到云南富民境内，这里离昆明不远。萧克告诉勃沙特：“我们决定释放你，马上就给你自由，你可先到昆明去。”勃沙特激动万分，吴德峰问他需要多少路费，他说需要4块银圆，结果红军给了他10块银圆。

4月12日，勃沙特正式获释。他的心情有些复杂，一方面，他希望尽快得到释放；另一方面，他与红军官兵结下了很深的情谊，这段朝夕相处的岁月难以忘怀。勃沙特来到昆明后，口述完成了回忆录《神灵之手》，后于1936年11月在伦敦出版发行。这本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红军长征的历史，比斯诺的《西行漫记》还早一年问世。

勃沙特和夫人在1936年10月回到英国。归国后，他们频繁应邀出席各种活动，发表演讲，向英国民众介绍中国红军，他说：“中国红军那种令人惊讶的热情、对新的世界的追求和希望、对自己信仰的执着，是前所未有的。”

综合自《名人传记》《世纪风采》
欣予 何立波/文

乾隆对“神兽”兴趣浓厚

从乾隆十五年(1750年)至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间，乾隆皇帝亲自召集两位当时重量级的宫廷画家余省和张为邦，交给他们一个重要任务——画动物。与此同时，傅恒、刘统勋、兆惠等“八大臣”也被分配了任务，给每一幅画配文字解说，并抄录典籍中的相关记述。于是，我们得以看到这两部中国历代宫廷及民间绘画上前所未有的画册——《鸟谱》和《兽谱》。

《鸟谱》为临摹，原作者是康熙朝进士、官至大学士的蒋廷锡。他工诗善画，尤其擅长画花鸟，还在与宫内西方传教士的接触中，掌握了一定的西洋画技法。余省、张为邦遵从蒋氏画风，历时11年，终于完成全套图册。

《鸟谱》完成后，乾隆没有把它和蒋廷锡的原作一起放在御书房收藏，而是放在了紫禁城内一处重要的居所——重华宫，方便在休息时随时翻看。

众所周知，乾隆的另一大爱好是盖章，《鸟谱》自然没能逃过。每册开篇第一幅画，都钤有“重华宫鉴藏宝”之印，每册最初和最末还钤“五福五代堂宝”“八徵耄念之宝”“太上皇帝之宝”玺，足见他对这套书的喜爱。

《兽谱》的绘制起止时间和《鸟谱》一样，由余省和张为邦按照《鸟谱》的体例和样式编辑，按照《古今图书集成·禽虫典》中的百兽形象绘制。这项工程的官方理由据说是以“百兽呈祥”彰显国家富强、富有四

海、万国来朝的景象。但笔者相信，乾隆就是好奇。

《兽谱》中有神兽、普通兽、异国兽。神兽虽然仅见于传说，但在书中所占比例较大。比如，麒麟在《礼记·礼运第九》《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拾遗记》等古籍中均有记载。在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麒麟往往与龙、凤、龟等组团出道，团名“四灵”，麒麟为首。如果去故宫参观，可以去慈宁宫看看，门口就守着一对鎏金麒麟，昂首挺胸，怒目圆睁，端的是皇家威严。

说到神兽，还有一部动物图谱的来历就更传奇了——《海错图》，由康熙年间来自民间的博物学高手聂璜，历经几十年，遍访各地江海湖泊，考察绘制而成。“错”，种类繁多的意思，早在汉代以前，人们就用“海错”来指代各种海洋生物，后来渐渐成为海洋生物、海产品的总称。这部书一度消失在民间，后在雍正朝由大太监苏培盛带入宫中，收入清宫造办处。乾隆继位后，非常看重这套书，曾连下数道圣旨要求把这本书送给他看，还让人把这套画册重新修补、装裱，并放在重华宫内，常常翻看。海和尚、潜牛、井鱼、蛟……这些只闻其名甚至闻所未闻的动物，存在于《海错图》中，也存在于乾隆脑海里。

至此，乾隆集齐了《鸟谱》《兽谱》《海错图》三大清宫版“神奇动物在哪里”，大大满足了无处安放的好奇心。据《中国青年报》蒋肖斌/文

